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夏朝真实存在的考古探索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在我国璀璨的五千年文明史上，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没有出土遗迹的证明无法承认一个朝代的存在。所以，为了探究夏朝的真实存在，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一直在做不懈探索，尤其当二里头文化发现后，夏朝的踪迹终于通过考古手段捕捉到。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二里头出土了带有“夏”字的遗存，夏王世系也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对应，但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这样的化石“史书”，仅从考古遗存本身发出夏究竟是国家的争论，还是非常有局限。所以，在考古领域，有关夏朝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位于河南郑州西郊的高新区沟赵乡赵村(东赵)南、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东距郑州商城约14公里，北距大遗址城址约7公里，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当“中原腹地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学术命题急需找到答案时，这一区域就被锁定为考古发掘的对象。这就是延续近3年时间的河南郑州东赵遗址发掘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一次为解答夏朝是否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而进行的探索。

大中小三座城址套叠

从2012年10月至201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东赵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6000平方米，发现大、中、小3座城址，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疑似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

据介绍，东赵遗址新发现的“大城”初步判定是西周时期的，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中城”是一座二里头时期的城址，面积为9万平方米，经推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中面积最大的，“小城”是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评价说，此次发现的大、中、小3座古城遗址，为进一步厘清夏商时期的时空关系有着重大意义，也为探寻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佐证。

新石器城址：夏之前的过渡期

新石器到底介于什么时期？这一考古

学上的文化分期得名于新石器遗址，它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18.6公里的刘寨镇新砦村，包括今梁家台、苏沟、东湾和煤土沟四个自然村的大部分区域，是嵩山周围大型史前聚落之一。由于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所以，考古学称之为“新砦期”。“新砦期文化”尽管有着承上启下的特质，但在考古界有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为只发掘到新砦遗址一个遗存，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新砦期文化有直接的承上启下关系。直至东赵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存在，更重要的一点是，东赵遗址充分证明了它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启下关系。

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介绍，此次在新砦期城址南墙外集中发现了40余座灰坑，灰坑口部均为圆形，大小相若，五六座为一组，残存坑口部填土多为质地紧密的红粘土。通过对已解剖的18座灰坑观察，它们均为袋状、平底，少数坑底再另挖小坑，出土陶片年代都为新砦期晚段。在部分坑内发现有猪骨架、龟壳、人骨等。对此，有关专家推测，这或是仓储类遗存，或与祭祀有关。

二里头时期城址：发现卜骨、童祭

“中城”遗址为二里头时期城址，始建于二里头二期，废弃于二里头四期。由于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址不多，东赵“中城”的发现对于夏文化的区域聚落形态及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重点对象。

“中城”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意外发现婴儿奠基的现象，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据介绍，用以奠基的儿童遗骸，是在城墙的某一层层中中发现的，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夯筑城墙的过程中，有将小孩埋入奠基再继续夯筑的制度，这种以人奠基的现象，在同时代的城墙修筑中极为少见。

同时，在“中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卜骨坑，出土数十块密集摆放的卜骨。这些卜骨都是被使用过的，上面有灼烧过的痕迹，也有卜兆，它们在一个卜骨坑里集中摆放，应该是多次占卜的结果。据考古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商代殷墟卜甲集中埋藏放置习俗(制度)的雏形。

大型回字形宫殿建筑基址

此次发掘还发现了一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回字形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为3000平方米，建筑基址内包含陶片，检测为二里头下层早段，二里头下层晚段灰坑打破该基址，据此，考古人员推测该建筑年代为二里头下层时期。这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

此外，“中城”里还发现疑似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的大型祭祀区：40多个祭祀坑排列有序，似有分组的可能，有的里面还有猪骨架和石铲。有学者认为，这里可能是仓储区。

东赵遗址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相对完整，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或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它的发掘对于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鉴于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和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能提供新的视角，对解决新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有重大学术价值，有考古专家认为，发掘几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也许更多的精彩将会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进一步揭示。



二里头时期城址城壕内奠基遗存



二里头时期卜骨遗存局部



二里头时期城址(东赵中城)城墙剖面

考古探秘

沿海地区早期人类用什么劳作工具

王有为

迄今为止，我国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贝壳质器物，由于此类材料质地坚硬、易于加工、制成器物后坚固耐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石器、木器类工具的缺陷和不足，而在渔猎经济尚占重要地位的远古社会，这种原料又得之甚易，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水生贝壳质材料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各种“贝器”不断地走向兴盛，到了我国夏商周时期更是进入了鼎盛期，尤其是在春秋以前的我国古文化遗址中，这类器物往往占有很高比例，大量出现于人们日常所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及装饰品等领域中，器形制作也越发规范、精美，直到铁器被广泛推广的战国时期才逐渐退出生产工具领域。

牡蛎器不同于一般蚌器

牡蛎器，顾名思义就是以牡蛎壳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器具。作为一种材质相对特殊的器物，这种器物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一般仅见于我国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属于典型的“贝丘文化”遗存，具有突出的海洋文化特性，其中以福建县石山文化类型遗址出土的史前牡蛎器最为典型和兼具代表性。

据考古发现，我国古代的贝器主要是用蚌类的壳制成，所以通常又叫做“蚌器”，

但由于此类器物形制繁杂，器形较小，又多为一般日常用品，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更缺乏对其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而在以往有关福建县石山遗址的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曾把这种用牡蛎壳制作的器具统称为“蚌器”。不过，牡蛎虽与蚌同属软体贝类，但两者的生活习性和形状却截然不同，蚌属淡水贝类，生活在江河湖的水底，而牡蛎则是常见的海洋贝类动物，属浅海贝类。牡蛎体形多变化，多呈三角形，壳上有许多类似树木年轮的弧圈，每年生长一圈，通过数这些弧圈，可知其年龄，它用一扇贝壳固定在岩石或其他外物上，通常是一扇稍大、稍凹，另一扇则略小、略平；因此，把牡蛎壳制作的器具也称为“蚌器”显然是不妥的。

牡蛎器如何做成的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牡蛎器的器物类型主要有铲、刀、耜和双肩器等。牡蛎铲的器形呈三角形、梯形或长方形，有的在器身中部穿双孔或四孔。牡蛎刀的器形呈梯形、长方形、椭圆形或半月形，器身多穿有对称双孔。牡蛎器的器形整体略呈三角形或梯形，有的在器身上部穿双孔。双肩器的器形呈扁长圆形，平背，有双肩。以福建

县石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史前牡蛎器为例，考古资料证明，这些牡蛎器均系利用一种生长年龄在4年至5年左右的长牡蛎壳(俗称“草鞋鞋”)，经简单敲砸去除表面突出钙质附着物，再于两侧及顶端粗磨加工、刃部精磨锋利，有些还在器身施以穿孔制作而成。

生产工具还是装饰品？

关于这些铲、刀、耜等牡蛎器的具体用途，长期以来学界通常认为是同收割农作物有关的生产工具，不过，也有人认为是一种装饰品。但仔细观察，它有使用痕迹，而且刃部锋利，似为一种刮削用的工具，因此，还有人认为其应是刮削器。其实，“耜”在我国古代很多文献中早有记载，且通常与另一种生产工具“耒”并称为“耒耜”，是重要的农具。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古代也确实存在过“耜耕农业”阶段，而且“耒耜”的使用年代也相当长久，直到商周时期还是重要的挖土工具，直到三国以后，这种工具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在福建县石山文化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均未发现有关水稻等农作物种植的确切证据，从该遗址出土的石、骨等生产工具看，基本都是石铲、网坠、石牙和骨角器等小型工具，且加工粗糙，多为

局部磨制，通体磨光者甚少，可以看出，渔猎和采集在当时县石山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结构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的食物来源仍然主要依靠捕捞、采集和狩猎。因此，这些牡蛎器的主要用途并非农业生产，而是适用于渔猎捕捞、山地挖掘及浅海滩涂采集贝类作业的一种独具材质风格和区域特色的砍砸、刮削和挖掘工具。

最早牡蛎器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

牡蛎器作为一种取材相对特殊的器具，目前在我国的最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较少，所以关于它的起源仅从质地很难展开深入研究。而从器形上看，福建县石山文化遗址(距今约四五千年)出土的这些牡蛎器和耜与同属新石器时代海洋性文化、但年代更早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出土的骨耜非常接近，有的在平面形制、钻孔位置及样式上几乎完全一致，甚至有些牡蛎刀也能够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刀中找到原型，因此，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或为这些牡蛎器的最早起源地。

对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而言，贝壳类生物影响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建县石山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大量贝壳堆积足以说明贝壳类是当时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这些食用后的贝壳经长年堆积，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贝丘文化”，从而也印证了《逸周书·王会解》中“东越海蛤”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在县石山遗址第6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19座灰坑和20多座墓葬中，有的灰坑内几乎全是蛤蜊壳，可谓名副其实的贝丘遗址，并且此时的县石山先民已懂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道理，他们把食用后的一些个体较大的贝壳，特别是长牡蛎壳，加工成各种器具，但可看出这些牡蛎器大都加工粗糙、制作工艺也相对落后，与浙江河姆渡文化发达的骨器、木器等相比，农耕痕迹不甚明显，农业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仍然徘徊在最原始的初级阶段。

(作者系福建省县石山遗址博物馆馆员)

4月15日，一场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的研讨会在山西省临汾市举办，会上，多位专家学者表示，陶寺就是尧的都城在考古学界已形成共识，“尧都平阳”的说法已成定论。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驷说，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至关重要的历史疑案，一个是何以“中国”？另一个是尧都何在？或者说尧舜禹真实存在吗？

始于1978年的陶寺遗址考古在几年前已经解决了第一个疑问。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漆圭尺。“陶寺圭尺地中刻度，从物证的角度说明最初的‘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从目前来说，陶寺就是最初的‘中国’。”何驷说。

那么，第二个疑问该如何破题？文献中没有确凿无疑地记载尧都在今天何地。《水经注》言“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然而，尧都地点还有其它含糊的文献记载，众说纷纭。

何驷说：“考古探索成为寻找尧都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从考古发掘与研究确定遗址的都城性质，再将相关考古资料与尧都相关文献记载系统对比，多角度考古证据指证尧都，最后综合得出结论。在临汾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遗址陶寺由此进入考古学者的视野。

考古专家表示，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的标准有城墙、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区、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和普通居民区。“陶寺遗址都城考古实际上就是考古寻找上述都城功能区划的证据。”何驷说。

1978年至1984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了居住区和墓葬区。2000年和2001年，又发现和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北墙、东墙和南墙，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由此得以确定。2013年以来，考古专家又对陶寺早中晚期城址有了更进一步了解。

何驷说，考古发现，大约20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已经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已成为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都城，都城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其中，宫城居城中偏北，东南小城为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区，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官管理的手工业区在城东南，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则设置在城内西北部。陶寺晚期则出现扒城、毁宫、毁王陵等特征显著的政治报复现象。

除了考古探索之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朱书扁壶“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此外，通过与《尚书·尧典》等历史文献的系统对比，也出现诸多契合之处。何驷说：“综合来看，陶寺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尧都平阳’。‘尧舜禹传说时代’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信史。”

在研讨会上，相关历史研究学者也从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结合的角度佐证了陶寺即尧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唐尧最初居于今河北唐县一带，然后自北向南迁移，中途经过晋中太原，最后定都平阳。“陶寺”与“尧都”在时空、龙崇拜、陶寺观象台遗址与文献天文历法以及文明发展高度等方面相吻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陶寺就是尧都。我们有责任让所有人都知道尧都就在陶寺。”

专家说：陶寺就是尧都

新华社记者 于振海 晏国政

西沙2015年水下考古正式起航

本报讯 4月12日，西沙群岛2015年度水下考古工作启动仪式在海南省文昌清澜港举行，经过2年多的精心筹备，备受关注的西沙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金银岛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由此拉开帷幕。“中国考古01”号考古船参与了此次考古调查，为配合相关考古工作，船队还配备了4艘辅助船参与工作。

西沙群岛2015年度水下考古工作考古作业范围为永乐环礁海域。经过各方的紧密配合和充分准备，由25名队员组成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工作队搭乘以“中国考古01”号为母船的船队从文昌清澜港出发，将进行为期45天的考古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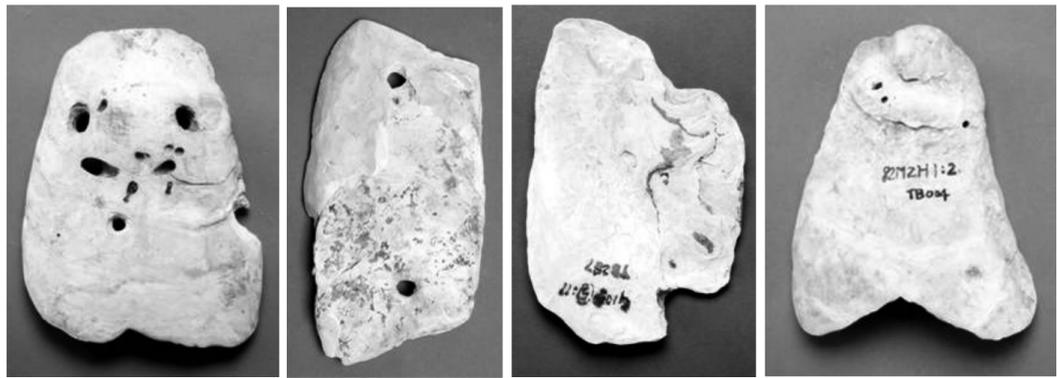
据了解，我国先民自古以来在南海从事生产生活活动，西沙群岛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必经之地，遗留下大量的历朝历代的水下文化遗产。根据考古队前期摸底调查统计，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和金银岛一号沉船遗址遗存有大量清代中期石质建筑构件与石雕像，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推测，应当是当时移居海外的先民，为在移居地修建房舍、祠堂、庙宇等而在国内订制的建筑材料，由于运送船只失事而遗留在该海域。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分布面积约100米×200米，水深2米至7米，距珊瑚岛距离约2000米。金银岛一号沉船遗址分布面积约150米×300米，水深3米至9米，距金银岛距离约2500米。(沙文)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元代石棺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集宁路古城遗址旗杆山墓地出土了元代石棺。

此次考古清理出元代墓葬59座，多为家族墓地。59座墓葬中发现随葬品的有22座，出土有陶器、瓷器、金器、铜器、铁器、石料器、骨器、木器、纺织品、钱币等。其有砖室墓、竖穴土坑墓、瓮棺葬多种，出土瓷器、铜器、装饰品多件，丰富了该时期墓葬研究的实物材料，对深入挖掘集宁路古城的文化内涵、复原集宁路古城的历史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说，在该墓地出土的石棺中伴有钱币、丝绸，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丧葬习俗，对于研究元代的丧葬风俗和丧葬制度有很高的价值。(李爱平)



铲 刀 双肩器 耜